

热风学术

热风学术 | 第八辑

REFENGXUESHU

主编 王晓明 蔡翔
本辑执行主编 雷启立

上海人民出版社

热风学术 | 第八辑

REFENGXUESHU

主编 王晓明 蔡翔
本辑执行主编 雷启立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风学术.第8辑/王晓明,蔡翔主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729-6

I. ①热… II. ①王… ②蔡… III. ①社会科学-文
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3569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薛 羽

封面装帧 汪 昊

热 风 学 术

(第八辑)

王晓明 蔡 翔 主编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0.5 插页 4 字数 353,000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729-6/G·1702

定价 48.00 元

目录

阅读当下

真实的“偏见”与“定见”的效果

——以传媒论述中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为例 潘家恩 / 3

土沟农村美术馆的十年营造 吕耀中 王卓薇 / 18

“农村是一所学校”：台湾高雄旗美小区大学的理论与实践

洪馨兰 张正扬 / 30

全球化危机与乡村建设运动 薛 翠 / 40

热风·观察

底层书 王磊光 / 55

我的公益之路 潘晓婷 / 71

关于永续生活的思考 黄志友 / 77

E 州杂感 王晓明 / 88

重返现场

“我对毛主席老忠的，到现在为止一直为工作”

——劳模裔式娟口述实录 董丽敏 郭丽君 / 101

“工人从来就不容易”

——县城女工张玉清口述史 马春花 / 120

鸡毛怎么能飞上天

——劳模吴佩芳口述史 郭丽君 / 135

改革时代的工人叙事

——从管新生、管燕草的长篇小说《工人》说起 文贵良 / 153

学习“劳动”

——以“大跃进”期间(1958—1961)上海市的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运动
为例 杨可伦 / 163

文本内外

被严拒的“叙事”

——冈林信康、张承志或亚细亚的阴影 坂井洋史 / 189

再现东方

——“中国风”新世纪音乐的文化政治 黄薇子 / 234

从“万青”乐队的一首歌和一张海报说开去 徐道衡 / 249

热风·论坛

世界史的构造性反复 柄谷行人 / 257

理论·翻译

斯蒂格勒：哲学作为武器 许煜 / 277

论符号的贫困、情感的控制和二者造成的耻辱 贝尔纳·斯蒂格勒 / 286

哲学与技术

——艾利·杜灵和贝尔纳·斯蒂格勒对谈 艾利·杜灵 贝尔纳·斯蒂
格勒 / 298

特别报道

文化研究的“双向突围” 朱善杰 / 313

编后记 / 323

阅读当下



本辑“阅读当下”事关乡建。

潘家恩，人称小潘，从福建、北京、河北、海南、香港、重庆……卷起裤管下田，抄起笔杆写作，这么文武一路地跑下来，说他是当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圈子里年轻的资深老专家，大概不会有人有意见。河北定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初创和关张，他都是亲历者，这次透过传媒回看自己的亲历历史，他的文章更表达的是改变中国社会哪怕一点点的复杂与艰难。

“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台北、高雄到台南的土沟农村、旗美社区，知识分子吕耀中和张正扬的经验和文章，再一次证明毛主席的伟大和正确。2013年5月，在“文化视野中的乡土社会与乡村建设”工作坊，人称“小黑”的吕耀中在会场上客气地坐了两天。听着各路英豪高头讲章的研究论文，他觉得很闷，于是给大家讲述了他的水牛设计部落在台南地区十多年间的各种艺术营造，生动有趣，“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小黑们的自觉，真正打破了艺术与生活、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隔阂。他和正扬等人的工作和报告，呈现出不一样的撩人画卷，令人遐想。欢迎“小黑”、正扬常跨界到大陆学术圈来玩。

小女子薛翠，走南闯北，翻译中西。她文中所述，菲律宾、巴西、印度、中国的乡建状况，很多也都是她亲历参与或亲往观察的，在现代化困局和全球化危机中，乡村建设运动，道阻且长！

（雷启立）

真实的“偏见”与“定见”的效果

——以传媒论述中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为例*

潘家恩**

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的乡村建设实践一直受到主流的各种评价与论述影响,这些叙述借助于“中立、客观”的名义对其进行着各种命名、分类、标签等建构,并进一步将乡村建设拉回主流逻辑及其主导的参照坐标下,在论述上压缩“另类”^[1]实践的可能空间。这既是乡村建设所需面对的重要挑战,也是其在具体实践中不自觉地接受派定位置或复制主流逻辑的可能原因之一。

笔者完整参与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各时期工作,本文以该机构为例讨论大众传媒如何与当代乡村建设实践进行互动,进而对实践的参照坐标、新的行动空间、实践者的自我认同产生影响。

* 本文为2012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专项重庆大学重点项目“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历史脉络与实践案例研究”(项目批准号:CQDXWL-2012-Z027)及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国乡村建设史述要》阶段成果。初稿繁体版以《“真实”的偏见——以大众传媒中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为个案》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七十九期(2010年9月),此处有较大压缩与改动。

** 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

[1] 此处“另类(Alternative)”为笔者从“双向运动”视野下对乡村建设等兼顾批判性与建设性实践的定位与理解,笔者认为所谓“另类”实践或“另类”运动都不是有别于“双向运动”外的第三种单独运动,它只是借助于“双向运动”视野,让我们看到“正向运动”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充分互动后的某种复杂表现。因此,“另类”与“主流”同样不可简单分割,否则其将同样的“去脉络”并营造出另一种“虚幻”,两者不仅相互包括,还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为中介和连接,不断发生着动态的转化。详细分析参见笔者博士论文《自我保护与“另类实践”——“双向运动”视野下的中国乡村建设》(香港岭南大学2012年)。

[2] 学院于2003年7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原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翟城村村民委员会、晏阳初农村教育发展中心、中国村社促进会现代化建设专业委员会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联合发起成立,学院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的公益事业,遵循非盈利原则,实行“劳动者免费就学”。秉承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前辈的平民教育理想与乡村建设精神,通过研究实践国内外及历史上各种乡村建设思想,培养乡村建设综合人才,推广乡村建设和农村综合发展实践经验。学院于2007年5月15日中止,转移至北京等地继续开展乡村建设。

一、大众传媒与“另类”实践

如果说来自学术界与批评界不同观点的研究评论是叙述层面影响历史乡建的主要力量^[1],当代乡建实践更受影响的外部叙述则来自大众传媒。既因相对^[2]历史而言,当代实践较少受到学术界的集中批评与讨论,还由于大众传媒已成为当代社会更具实际影响力的评价体系与操作力量。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各种报道为例,大众传媒参与了学院的创办直至关闭的全过程,同时具备叙述者、批判者与影响者等多重角色,叙述上虽然充满裂隙与矛盾,但却产生着影响现实实践的能力与效果。

关于现代大众传媒的重要性,正如学者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2003:8)所指:“媒体拣选^[3]、形塑了每日生活的样貌,媒体所呈现出的多元景观,成为一种检验标准与参考指标,引导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定义、维持了人们的“常识””。即使主流叙事,也必须要经过大众文化的改写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这个匿名然而却无处不在的“超级读者”所接受(黄平,2007)。在研究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之媒体呈现的托德·吉特林(2007:导言9)看来:“在一个日益模糊与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大众媒介来寻找并试图发现自我”。

大众传媒在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上,一方面如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所指:“大众传播媒介凭借凝结社会的霸权符码的生产而发挥作用,看起来反映现实但实际上是构建现实”(转述自雷启立,2008:16);但另一方面,媒体与社会

[1] 详细参见拙文《中国乡村建设研究述评》,《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2] 实际上,历史上乡村建设也大量借助于传媒的力量,如晏阳初于借助美国《读者文摘》多次报道以筹集包括财务和人力的各种资源。因为在如此一个以现代化和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进程中,“乡村”和“改良”要想挤进人们的视线,并获得应有的关注和参与,媒体似乎是最便捷与主要的途径,其的确起着十分重要的“中介”(mediation)作用,同时媒体自身也以特有的方式极大程度上参与了这场运动。故此处强调的是“相对”。关于历史乡建与媒体的互动可详见曹立新:《媒介与社会变迁:定县实验中的传播实验》,《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3期。

[3] 正如台湾学者夏晓鹃结合当地媒体对“外籍新娘”及“外籍新娘识字班”的叙述策略后指出,虽然媒体都声称“客观”,但它们取样、强调及省略的重点都是高度选择性的(2002:137)。

也有着特别的辩证关系(托德·吉特林,2007:173),亦即魏灼(2010:342)所指:“传媒的新闻报道绝非如镜子般在反映真实,而是在构成真实。但是传媒所构成的‘真实’对整体社会而言,仍具有‘事实’的效果,进而回过头与社会真实紧密互动、交互影响。”

至于媒介如何发挥作用进而影响社会,托德·吉特林提出媒介框架(media frame)的存在:“它是选择、强调和表达的原则,由很多对存在、发生和发展的事物加以解释的细微理论构成。既是认知、解释和表达的连贯模式,同时也是事件操纵者组织言论的过程”(吉特林,2007:导言 13—14 页)。这种“过程”也为罗杰·西尔弗斯通(2003:19)所特别强调:他认为应把媒体视为一个“中介”^[1]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拉开视野,“不仅把中介意义局限在媒体文本与阅听人之间的接触,还应把中介过程视为媒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与对意义的使用和操作上。

具体到中国当下状况,雷启立(2008:4—5)指出:“对于中国公众而言,媒体的自由仍然是通往自由、民主、公正理想社会的桥梁”;戴锦华(1999:36)则强调:中国传媒之所以显现空前力度,事实上是“权力的媒介”与“媒介权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互结合并彼此借重的结果。因此,当代传媒所具有的“双重性”就十分明显:一方面,它要适应市场要求,保证其收视率与发行量,从而获得更高的广告收入,因此需要文化民粹主义立场与能够充分体现底层和草根等平民形象^[2];另一方面,实际上又很难掩饰其实质上的文化精英主义立场。

而对于大众传媒与“另类”实践的关系,现代传媒时代常让其面临着类似的“两难”:媒体既增强同时也是削弱“另类”实践的力量。^[3]如果与媒体疏离,它们的声​​音发不出去(赵鼎新,2006:268;徐贲,2006:72;托德·吉特林,2007:导言 10),因为这几乎是最主要的传播渠道;如果通过媒体,声音则常被扭曲、收编与无害化。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应该透过“大众传媒对社会运动天然同情(林芬、赵鼎新,2008:97)”的表象进行更深入与脉络化的讨论;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虽然主流传媒的意识形态框架大多偏向统治集团而不利于“另

[1] “中介”了什么?为达到更理想效果,它无疑需要借助于受众的日常生活经验、欲望需求及所谓常识,并以更多的细节和个人化体认去贴近“真实”,用人物和事件去充满“真实”,再以“真实”的质地成为说服读者的有效手段,下文各种例子可进行某种说明。

[2] 如中央电视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等节目名。

[3] 同时媒体还改变了这些力量运作的环境(Roger Silverstone, 2003:5、30),并由于变得和现代社会的常见逻辑高度同构而相对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与接受。

类”实践,但却不能简化为“传媒污蔑异议者并摧毁社运”(魏灼,2010:342)等类似处理,两者都同样不利于我们对完整脉络与互动关系进行复杂动态的把握。

二、呈现中的建构

下文首先将以两组媒体叙述文本为例,引讨论这些既包括十分严厉的批评质疑,也不乏言过其实的过誉追捧,是如何作为各种形式的“呈现”(representation)共同构成乡村建设的外部环境与舆论脉络?然后,笔者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比起历史乡建严肃的学术批评,为何如此“传媒幻象”^[1]能成为当下社会评价“另类”实践的主要标准并发挥着重要影响?

1. 命名、修辞与想象

出于职业要求与行业特点,大众媒体都自我要求或对外包装出所谓“客观、冷静、中立”这一基本形象。然而如果对这些被建构出来的基本形象进行逐一分析,将会发现其中充满着无数并不冷静的“命名”、并不中立的“修辞”和并不客观的“想象”。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创立伊始,就在短时间内被快速地命名着:一方面是各种欢呼与兴奋下的判断:如“晏阳初重返定州”^[2]、“温铁军:乡村建设运动的复兴者”^[3]、“翟城试验:寻找梦中的诺亚方舟”^[4]、“晏阳初乡建精神犹在、新乡村试验扎根定州”^[5]、“追随晏阳初的脚步”^[6]等。来自大众传媒的“兴奋”,既反映了当年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及由此引发公众对行动所可能引发新希望的

[1] 在此借用雷启立关于中国当代生活与媒体文化分析的专著名称《传媒的幻象——当代生活与媒体文化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2] 康雪:《晏阳初重返定州——晏阳初乡建学院成立现场采访》,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03年8月。

[3] 《温铁军:乡村建设运动的复兴者》,2004年1月《国际金融报》。

[4] 黎光寿:《翟城试验:寻找梦中的诺亚方舟》,《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年2月。

[5] 安文联:《晏阳初乡建精神犹在 新乡村试验扎根定州》,2005年7月24日《燕赵晚报》。

[6] 《追随晏阳初的脚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简记》,《燕赵风采》,河北人民广播电台2004年7月31日新闻频道。

普遍期待^[1],也正是大众传媒对各类社会实践的常见态度与惯用手法。

但同步进行的另一侧则是同为主流媒体基于一般逻辑所作出的质疑。例如,在2004年4月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第一次农民培训时,就有记者用不到半天的时间做了“中国第一所村办学院生存忧患调查”“办在村里的学院还能走多远”^[2]这样“发人深省”的报道。

在这两种对立统一的判断与想象^[3]下,各种充满矛盾的命名始终伴随着乡村建设学院的不同发展阶段。如:“乌托邦”实践^[4]、“农民黄埔军校”^[5]、“后定县试验”^[6]、“新上山下乡运动”^[7]、“温铁军的乡村星火”^[8]、“田园牧歌”似的乡村建设^[9]、“秀才下乡”^[10]等。这些命名一方面体现并实现着主流对“另类”实践的常见定位与处理^[11],另一方面也干扰着实践内外群体对乡村建设复杂性与多样性的把握。

除对社会行动的状态、趋势、问题进行简化与命名外,大众传媒还巧妙使用

[1] 如在一篇题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载得动三农几多愁?》的文章中(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6899,2009年5月2日),记者谭翊飞认为:“众所周知,农民最缺乏的是物质利益,即改善生活,而不能改善生活的根本在于其权利的贫乏,农民尚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权利,然而,这些厌烦于西方高度民主自由社会的人却来大陆用最贫穷的群体做后现代的实验,这岂不荒唐?岂不可笑?”笔者认为:除观点值得讨论外,这种把一个很小民间草根实践安放到要“‘载得动’三农几多愁”的预期中,是值得反思的。

[2] 聂道先:《办在村里的学院还能走多远?》,载新浪网财经频道(http://finance.sina.com.cn)《温铁军翟城试验:中国第一所村办学院生存忧患调查》,2004年。

[3] 事实上即使被报道方非常不认可其中的一些命名,比如所谓“农民黄埔军校”等,但因其符合受众的一般期待与想象,而巧妙地让读者很难感觉出其中的暴力与不妥。

[4] 《“乌托邦”实践 温铁军把“另类”进行到底》,《亚太经济时报》,载新浪网2004年7月9日财经频道。

[5] 卢韵、曾子墨:《乡村建设学院——中国农民的“黄埔军校”》,《凤凰周刊》2004年第13期;《打造新农民的“黄埔军校”》,2006年5月12日《中国青年报》;马海伟:《“农民黄埔军校”试验三年之惑》,2006年5月23日《中国商报》。

[6] 姜古迪:《值得关注的后定县实验》,2003年8月24日《燕赵都市报》。

[7] 黎光寿:《新上山下乡运动——我们能为农村做什么?》,2003年11月6日《公益时报》。

[8] 《凤凰卫视—财经点对点》,《温铁军的乡村星火》2004年4月。

[9] 张志:《翟城乡村试验遇困局》,《小康》,载www.gutx.com,2004年5月6日。

[10] 《秀才下乡》,2005年9月《凤凰卫视》。

[11] 有些命名可能“捧上天”。只是这些“传奇”神话需自我维护,一旦在现实中不能符合媒体或由之引导受众的期待或想象,媒体则会及时挺身而出,用“实地访谈”和对“不同声音”的代言,戳破那个不久前由自己所制造的神话;有些命名可能提前“宣判死亡”,以“怜悯惋惜”为姿态去取消实践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

大量的修辞手法,配合“命名”以更有力达成叙述者所希望的效果。如下面所引新闻标题里的各种修辞:“定县实验”新登场^[1]、乡建学校的“荒芜英雄路”^[2]、“步履蹒跚中的乡建运动”^[3]、“晏阳初到温铁军:知识分子百年乡恋”^[4]、“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冲动”^[5]、“新‘定县实验’终局?”^[6]、“改良主义者败局?”^[7]等。除标题外,正文中的一些句式和表达方式也有着同样的处理与预期效果,如:“(晏阳初、梁漱溟)是否都是糊涂的好人?乡建是唯一希望?还未乡建的农村,希望何在?”^[8]

罗列如此多的标题与片段,重要的不是进行某种事实层面的指认或检验,而是希望通过比较与联系指出其“去脉络”这一共同特征,并进一步讨论为何这种看似丰富多元实则刻板单调的“命名”与“修辞”,会成为大众传媒对当代乡村建设叙述与呈现的主要类型?

一方面,正如前文对媒体“中介”特点的分析,其“中介”起了主流社会对“另类”实践的一般想象与期待——应该是什么形象(轰轰烈烈、万象一新?);应该什么影响(载起三农?);应该需要何种条件等等。实际上,这些想象与期待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主流的政治经济结构与文化导向,是需要不断加以质疑与问题化的。

另一方面,它同样“中介”起了媒体生产者及受众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由此反向构建出浪漫化与怀旧化的虚拟历史,实际上其仍是以静态和“去脉络”为主要的处理方法。例如在《中国新闻周刊》的“新农村的理想与现实”同期报道中,虽然对当代实践充满质疑,但当谈到该实践地点时,笔调则反转为依恋与抒情:“翟城:在这个北方的村庄,知识分子求解乡村问题的探索已承续了近百年”^[9]。在另一篇批评当代实践的文章中,当谈到历史时笔锋也迅速调转:“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跟随晏阳初的知识分子,脸上总是带着兴奋与高兴的笑容。据统计,最

[1] 白红义:《“定县实验”新登场》,《小康》,载 www.gutx.com, 2004年9月。

[2] 胡印斌、王小波:《乡建学校的“荒芜英雄路”》,2004年7月18日《燕赵都市报》。

[3] 曹海东:《步履蹒跚中的乡建运动》,2007年7月《南方周末》。

[4] 曹筠武:《晏阳初到温铁军:知识分子百年乡恋》,2006年3月9日《南方周末》。

[5] 何忠洲:《新农村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7期。

[6] 翁仕友:《乡建学院关闭 新“定县实验”终局?》,2008年1月7日《经济观察报》。

[7] 林海:《改良主义者败局?》,《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参见 <http://blog.sina.com.cn/rwzk>。

[8] 林海:《温铁军:改良主义者败局?》,《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1月21日,参 <http://blog.sina.com.cn/rwzk>。

[9] 何忠洲:《新农村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7期。

高峰时期,晏阳初在定县团结了多达500名‘愿意和农民在一起’的知识分子”^[1]。

然而,当我们历史化的处理乡村建设历史,将发现这种整齐而连续的叙述实际上遮蔽其间所存在的各种裂隙^[2],大众传媒叙述所强调的“博士下乡”整体群像也让我们忽视其中的另一面——无论历史还是当代的乡村建设实践都同样因自身的“另类”定位而充满着内部张力。^[3]笔者之所以如此提醒,重点不在于揭破媒体构建的神话本身,而是希望由此引起对这种相对容易获得接受之叙述模式的反思。

总之,通过“命名、修辞和想象”这种大众媒体常见的简化处理与类型化方式,乡村建设叙述抽离于乡村建设实践本身的复杂脉络,被裁剪构建成为一系列符合媒体需求与内在逻辑的抽象概念与结论判断。

2. 传奇与个案

通过大众传媒的视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或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经常有着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开局。许多媒体都会以类似故事为开头——2003年春节,温铁军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杂志社编辑刘老石与邱建生带大学生们去河北定州翟城村调研,因为恰值大年三十,大学生们即兴在所住处写了一副春联:“平民教育诚可嘉,乡村教育慨而慷,(横批)继往开来”,这副春联很“偶然”地被村党支部书记米金水看见并引起注意,双方一拍即合,决心在翟城重续晏阳初的梦想。^[4]

不仅平面媒体对该情节进行了大量的复制与再生产,很多纪实类专题片或纪录片也都“再现”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景,编导们重新刷上墨迹未干的对联,可谓用心良苦;观众们则因此而“如临现场”,更可谓“效果”不俗。从普通读者/观众来说,类似情节与表达方式容易获得接受,并且其表现内容的确真实发生,本无可厚非。笔者之所以提出来讨论,重点在于当媒体对其反复强调并选择性关注之后的实际效果。通过对“戏剧化”和“偶然性”局部的凸显,不经意间遮蔽了

[1] 曹筠武:《晏阳初到温铁军:知识分子百年乡恋》,2006年3月9日《南方周末》。

[2] 如晏阳初刚到翟城村,由于照搬其在大城市推广平民教育的经验而遇到挫折,有村民向晏阳初提出,“晏先生,你老的好心肠,可是帮不了我的饿肚皮!”(郑大华,2000:73)事实上,类似问题和冲突同样充满于历史乡村建设实践各个时期。

[3] 当年他们之间的各种内部矛盾同样频繁,并且很多人来了不久就走,据晏阳初回忆,他自己在定县的近三分之一时间是在做这些人及他们家属的工作。

[4] 何忠洲:《新农村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7期。

乡村建设实践更为整体全面的脉络。^[1]与此同时,为进一步配合读者/观众的接受习惯与偏好,以达到“感同身受”并通过想象进行参与之目的,大众传媒的另一个常见做法是将“传奇”主角“归纳/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个人”。类似处理^[2]同样不经意地达到另一种“去脉络”效果:如果成功,那是个人道德的崇高,敢为人先,过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如果失败,那也是个人的“理想主义”“不切实际”“乌托邦梦想”……作为大众传媒版“好人好事”^[3]式的类型化处理,略有不同的是,当它作为传媒对象被放置于茶余饭后“阅读/讨论”的客体位置时,所谓的“理解”、“认同”将更加有限与脆弱。^[4]

从“传奇”开局到“个案(个人)”落脚的常见处理方式,配合着前文的各种命名与修辞,不仅遮蔽和简化了“另类”实践的复杂脉络,更阻碍了不同群体对各种深层次问题的追问与挖掘。^[5]作为批评与介入现实的“媒体利刃”似乎常常重重

[1] 如果回到脉络,即使这一“故事”本身也有丰富的来龙去脉:如在2003年春节之前,温铁军所主持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就已经在该村以外的很多地方开展了乡村建设与大学生支农实践;翟城村想利用“晏阳初”进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想法也由来已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当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农产品出口受很大的影响,这不禁让依赖辣椒出口的该村村民们产生了质朴的看法:“假如晏阳初还在,就好了”(2004年村支书米金水对笔者的口述记录);而促成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创立的更重要背景则是当时“三农”矛盾加剧,“三农”问题一时成为包括学界、官方、民间的共同“热点”,正是有了这一系列的条件与土壤,那个戏剧性的场景才可能发生。

[2] 如托德·吉特林对1960年代大众媒体中美国学生运动的分析认为:“在对现实的诠释中,组织、机构、运动——实际上,所有更大、更持久存在的社会组织——都沦为了一种个人象征。(2007:104)”

[3] 笔者认为,在对乡村建设的评价与研究中,存在着较多“好人好事”的处理,类似做法对公众认识乡建有一定程度和阶段上的效果,但所进行以“个人/个别”为单位的处理,也容易将乡村建设丰富实践和复杂脉络简化压缩为一般性的“(好)人”和“(好)事”。详见拙文《中国乡村建设研究述评》,《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4] 姑且举例,如果采用现代传媒叙述风格,历史乡建前辈的光环必将短暂而脆弱。第一年,我们可以对这位“海归”博士(晏阳初)的生存状况进行“忧思”(刚回国时,“平教会”活动经费非常困难);第二年,我们可对其解决不了“饿肚皮”(参见前文中村民对晏先生到农村后照搬大城市扫盲做法的抱怨)进行反讽与反证;第三年可以对运动内部博士及家属们种种矛盾和随时的退出进行曝光揭秘或悲情预言。最后,我们将以“花了那么多钱,做了这么多年,今天的定州农村比起周围农村来说,又有什么明显不同?”作为有力审判,以得出“不过如此!”、“失败/不成功”式的结论。

[5] 如有媒体对当代乡建实践者以“秀才下乡”为命名和戏剧化处理。无论产生的是嘲讽还是愤怒,实际都不利于更重要的一些追问:例如,除这些“秀才”外,当今“下乡”的还有什么人/力量?这些“秀才”很多本来来自农村,为何他们回乡后会如此“蹩脚”?是什么让他们成为我们结论中的“秀才”?既然他们可能更知道自己的“蹩脚”并感受到舆论的压力,为什么他们还坚持下乡?那些本来的“在乡秀才(本地能人)”都到哪里去了?“秀才下乡”和“乡下人进城”是否同样深刻地体现着城乡二元对立下的各种可怕偏见?

举起,但却总是轻轻放下。一方面,前赴后继的媒体人以“接力”方式参与着对乡村建设这一“另类”实践的关注与评判,以“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传统故事模式进行着裁剪与建构。另一方面,经过各种“去脉络”处理之后,抽象而空洞的“另类”实践则不同程度地被“中介”于主流社会的逻辑与结构中。例如,当乡村建设实践被“去脉络”地呈现为“好人好事”时,同时也被“中介”^[1]进主流社会下某种常见焦虑与心理——大家都不切实际地期待着有一群“崇高/传奇”的“他者”,更好地让我们共同的问题得以解决^[2],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同样可确保这个过程中自己内心的平衡。^[3]

3. 从“偏见”到“定见”

通过以上分析,如果采取整体性视野^[4],被呈现和建构的所谓“正见”其实充满着各种“偏见”,客观性同样也存在着欺骗性与保守性,类似观点已有国内外学者结合不同案例进行过分析(托德·吉特林,2007;雷启立,2008;赵月枝,2011:90—94)。而本文的在地案例实际也反证了有研究认为的“西方媒体才以报道的方式摧毁或改变社会运动性质”(赵鼎新,2006:278)。

-
- [1] 很多人似乎只是以“乡村建设”为由头,利用弱势群体的位置,以反抗者的姿态说出自己一直想说或一直在说的话。我们似乎听到各种问题,但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一种对提问者观点的再次验证与一贯立场的再次强调,而很少有人真正进入那个讨论脉络,逼视产生出如此社会行动及困境的现实问题。
- [2] 夏晓鹏认为:“‘他者’是‘自我’的反射。其在心理层面的效果是,凡是‘自我’所不愿承认的性质,都收录于对‘他者’的描绘之中。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借此将‘自我’从面对社会问题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因为他/她已找到问题的原因”。(2002:245—246)
- [3] 当原来的“成功”出现所谓“失败”时,“不过如此、又能怎样? So What……”同样可以有效舒缓大家的不安。除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外,另一个可以呼应的典型案例是“安徽复兴学校”:先是“志愿者神话”的传奇/悲壮开局,然后是对“神话主人公”亦即道德楷模的个人进行严厉的道德指责,当昔日被冠以道德光环的“英雄”被我们迟地发现为“竟也是普通人”——原来如此!难怪!……随着类似的感慨,似乎极大程度地释放了相比之下“我们”的“道德压力”,但客观上却令一场广泛的志愿者事业遭受挫折。关于该案例的详细过程可参见(朱健刚,2008)。
- [4]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呈现了与西方完全相反的模式,中国媒体不但倾向于对社会运动做正面报道,而且还会挑战现有的制度并积极介入大量的社会运动。(林芬、赵鼎新,2008:114)”,笔者认为如果在整体和动态的视野下,“正面报道”也是充满差异与流动变化的,媒体所积极介入的社会运动也有一定的“选择性”,主要限于其基本价值与主张相近之部分社会运动,以上两组乡村建设的媒体呈现与前后变化即可提供例证。

既然“偏见”存在,其如何不断“自然化”成为我们习以为常^[1]并日益定型的“定见”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与讨论的议题。一方面,当下中国已进入媒介社会,作为社会实践类型之一的媒介话语通过说明并阐发“客体”、“社会主体”、社会主体的“主体地位”以实际上获得建构性的社会效果(孙玮,2008:75)。而当前中国传媒所显现的空前力度,事实上是“权力的媒介”与“媒介权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互结合、彼此借重的结果(戴锦华,1999:36)。那些与民众生活更加紧密结合,被工业化、市场化和商业化所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实际上则与媒体存在着共谋关系(汪晖,2009:347)。这些都共同构成当前大众传媒的文化霸权地位。

另一方面,媒介逻辑其实只是主流逻辑的某种反应与组成部分,其属于社会并被一个创造新秩序的现代社会所塑造(托德·吉特林,2007:173)。笔者认为,当代中国传媒不同程度的内在于近代中国以“百年激进”为特点的“正向运动”^[2]土壤及想象中(温铁军,2011;潘家恩、杜洁,2011),该时代脉络作为数代主流知识分子追求与梦想的现代化大计,产生着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知识生产、评价体系在内全方位转型的认同、依赖与迷信,影响全面并持续至今。然而,对于以原住民性质的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并以农业文明为主要载体的乡土中国来说,由此也产生着多种层面的“去脉络化”(脱离基本国情与来自生态、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限制)效果,乡村建设即是相应而起而带有“社会自我保护”部分特点并对主流构成建设性挑战的“另类实践”。其在激进“正向运动”主流坐标中的相对边缘与“他者”位置才是正常,由此,媒体呈现中充满“流动性”与“对象化”并被规范后的“乡村建设”经典形象则成为广大受众乐于接受的常态与常识。

三、效果与影响

笔者还认为,重要的不是“真实”本身,而是其所产生的“真实”效果与影

[1] 媒体如此辛苦的“代为”跟踪和“直指本质”,让观众(更准确说应是消费者)跟随摄影机或媒体人的眼睛,不需要很费劲,尽可能轻松、快速、便捷地“挖出”真相或享受到这样的一种感觉!与其说是媒体运作的成功策略,不如说也是观众读者早已习惯的认识事物方法——我们已经不习惯模模糊糊,更习惯于爽快地给出一个“黑白分明”、更为“准确”的答案。

[2] 此概念及下面的“社会自我保护”均出自卡尔·波兰尼《大转型》,关于该概念在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分析详见笔者博士论文。